

维新运动史论文选编

涂鸣皋 钟大群 编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印

前 言

《维新运动史论文选编》是为我系开设选修课维新运动史提供的教学参考资料，供学生阅读使用，也可供从事维新运动史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者参考。

本选编主要选用的是建国以来至1983年国内报刊所发表的有关维新运动史的部分论文，还选用了广东社会科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于1983年9月在广州召开的《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的几篇论文，在此向论文的作者致以谢意！为保持论文的原意，所选论文都是原文照录，均未加以增删。

因篇幅有限，不可能选用所有的论文，为弥补这种缺陷，我们辑录了建国以来国内各报刊发表的有关维新运动史的论文目录索引，作为附录，供读者查阅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编选工作难免有缺点，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一九八四年

目 录

前言	编者
维新运动史综论	涂鸣皋 (1)
从“变法”的演变看维新运动	方志钦 (22)
试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潮	章开沅 (41)
试论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	吴雁南 (57)
略论郑观应的变法维新思想	
——读《盛世危言》	严方 (69)
廖平与康有为	钟肇鹏 (83)
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	李泽厚 (88)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戴逸、李文海 (112)
论维新运动时期的康有为	涂鸣皋 (126)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思想	
的特色	熊月之 (153)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	
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陈旭麓 (180)
严复与严译名著	王拭 (203)
“强学会”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作用	汤志钧 (226)
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	汤志钧 (238)
略谈湖南戊戌维新	卢智 (255)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	
与守旧派的斗争过程	卢智 (270)

清末维新派的“开民智”思想·····	程合印 (285)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民权观·····	李文海 (300)
戊戌变法时期关于民权问题的辩论·····	杨玉厚 (317)
帝党与戊戌变法·····	祁龙威 (332)
论光绪皇帝·····	马天增 (350)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帝和康有为·····	钟卓安 (370)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	谢俊美 (391)
张之洞与维新运动·····	王 拭 (400)
李鸿章与维新运动·····	苑书义 (421)
光绪与慈禧矛盾性质剖析·····	杨光楣 (454)
戊戌变法中英国政府的态度·····	王 拭 (466)
戊戌变法与日本·····	沈镜如 (482)
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	邓广铭、张希清 (499)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叶林生 (507)
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	李时岳 (523)
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	
——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	杨立强 (534)
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作用·····	杜永镇 (548)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	黄焕宗、胡永树 (563)
官僚政治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陈忠信 (577)
附录(一):	
1、关于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评价	
若干问题的综述·····	凌 芝 (583)
2、关于光绪帝的评价问题·····	张林那 (594)
附录(二):	
维新运动史报刊论著目录索引·····	钟大群 (601)

维新运动史综论

涂鸣皋

维新运动史，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历史。维新运动，通常称戊戌变法，或称戊戌维新，因为这次运动的高潮是在1898年，这年是中国旧历的戊戌年。但是，这次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运动，有个酝酿准备、兴起发展到高潮和最终失败的过程，如果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维新思想的酝酿开始，到1898年顽固派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为止，那就经历了二十多年。因此，我们研究维新运动史，就要研究这次运动从酝酿到失败的全过程，必将涉及这次运动的各个方面。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准备就维新运动史的分期及其主要内容，维新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一)

维新运动是在十九世纪末年，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初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的明显特征：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二是发展资本主义；三是改革社会现状。其途径就是学习西方。根据上述历史特点，探讨维新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可以把维新运动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1875年左右——1895年，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大约二十年左右时间，这是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康有为从事早期变法活动的时期。

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已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紧了殖民地的争夺，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渐深重；清政府的洋务运动逐步破产，没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抑下，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先后出现了一批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家，通称早期维新派。他们著书立说，献策立言，主张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在中法战争前，他们的主张，偏重于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中法战争以后，则明确提出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即议会政治的要求。此时，康有为开始了早期变法维新活动，他于中法战争后，首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法的初步建议；后设立万木草堂，招授生徒，积蓄变法力量；又从事于变法的理论著述，奠定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为维新政治运动的兴起作了一定的准备。

第二，1895年——1897年底，即甲午战争以后至德国强占胶州湾前夕，大约两年多时间，这是维新政治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深重；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初步发展。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派在《公车上书》及其他奏书和政论文章中，提出了变法维

新的社会改革方案。维新派在帝党官员的支持下，相继建立学会、学堂和创办报刊，传播变法维新思想和聚集变法维新的力量，出现了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广东等几个变法维新运动高涨的中心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维新政治运动。总的说来，维新运动尚处于宣传和组织发动阶段。此时，以张之洞为首的新洋务派，力图插手和控制维新运动，尚未与维新派公开对立；后党顽固派一开始便破坏维新运动。由于帝党对维新派的支持，加之维新派的艰苦奋斗，维新运动日益高涨。

第三，1897年底——1898年9月，即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至“百日维新”失败为止，近一年时间，这是维新政治运动进入高潮和走向失败的时期。

这一时期，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开始，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自甲午战争以来，国内阶级矛盾有所激化，全国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连续上书皇帝，要求及时变法图强，并在各种学会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保国会，提出保国、保教、保种的宗旨。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终于下诏变法，维新派得以参与新政，出现了“百日维新”，从而把维新政治运动推向了实践阶段。这一时期，张之洞抛出臭名昭著的《劝学篇》，公开对抗维新运动；顽固派竭力扑灭维新运动，终于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宣告失败。维新派有的遭杀戮，有的被迫逃亡，有的被贬革职，维新政治运动也就宣告破产。其后，康、梁等人仍在海外从事“勤王”活动，企图恢复光绪帝位，重新推行维新政治，这已是维新运动的尾声了。

(二)

维新运动发生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发展长河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论著中多次谈到，如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①这就明显地把戊戌维新视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发展阶段。其所以如此，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论述这些发展阶段时指出：“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②他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这些发展阶段“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③即是说，这些发展阶段都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指出这些重要的发展阶段，“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④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总体上来考察的，因此他充分肯定了戊戌维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同时，毛泽东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把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中的康有为、严复，与洪秀全和孙中山同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认为他们是“先进的中国人”，“求

进步的中国人”。⑤由此观之，维新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要研究维新运动，首先必须弄清这次运动的性质。关于维新运动的阶级属性，多年来史学界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这似乎没有疑义了。可是近几年内，有人认为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执行的是洋务派的政策；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放弃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倒退成为新洋务派。按照这种观点，维新运动只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成了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其资产阶级属性就成为问题了。对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仍然坚信维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其理由是：第一，这次运动发生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代，其物质基础是中国初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即刚从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来的那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发动这次运动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这些人本身虽不是民族资本家，但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意志和愿望。他们大都是从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向西方寻找真理，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有的人还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关键在于维新派的政策反映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这可以从他们的纲领中得到说明：政治上，维新派要把中国变成西方模式的君主立宪国，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不主张马上召开国会和制定宪法，那是由于他认为条件不成熟，不是他背叛了君主立宪的纲领；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明确地提出把中国“定为工国”；军事上，维新派主

张建立一支近代化的陆、海军，以巩固国防，保护商务，抵御外侮；文化上，维新派要求兴西学，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来建设近代化的中国。总之，维新派的目的，是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正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主要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意志和愿望。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确认维新运动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

确定了这次政治运动的资产阶级属性之后，还必须解决它是何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这就是把戊戌变法说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把维新派称之为“改良主义者”。近几年来，有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在学术讨论中，又有人把戊戌变法说成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我认为戊戌变法既不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运动。

为什么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呢？因为改良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使用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出现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是欺骗工人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一股反动的历史潮流，它不能与救亡图存、改革现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运动相提并论。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无论是产生的历史背景，或是阶级内容和它们的目的、作用诸方面，都炯然不同。改良主义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维新运动却发生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刚刚产生不久、民族资产阶级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年

代，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后者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新生阶段。改良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工人贵族；维新运动的阶级基础则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上层。改良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之中，起着破坏工人运动的反动作用；维新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起着变革旧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改良主义的目的是要用改良来顶替无产阶级革命，妄图维护资本主义旧制度；维新运动的目的并不是用改良来对抗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要求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制度，因为当时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它只不过是民族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一种尝试。由上可知，显然不能把戊戌变法称为“改良主义”，即不能把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反动逆流和使用的概念，硬套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头上。自戊戌变法以来，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把戊戌变法称之为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而不称为改良主义。对戊戌变法称为改良主义，大致始于三十年代，即1933年陈伯达所写《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一文，认为康有为等人找到了“改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变政道路”。⑥其后，范文澜于1945年著《中国近代史》，则明确提出了“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⑦解放后，史学界便沿袭这种观点。究其根源，一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强调革命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把批判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列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任务，这显然是属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二是混淆了改良和改良主义的界线，因为改良和改良主义不是相等的概念。改良和革命是一组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概念；改良主义则是与马列主义相对立的概念。改良与改革、改新、革新是同义语，它与革命虽是对立的，但二者都是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的运动形式，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革命之前，

改良往往成为革命的先兆和前奏，成为走向革命的一个过渡阶段；在革命胜利以后，改良还可以成为革命的补充。改良主义则不同，它一开始便是作为马列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是“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⑧因此，改良主义是反动的，毫无进步可言，它与改良或改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既然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又为什么不能称之为革命呢？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⑨他又在《对时局的估计》一文中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标志”。⑩他还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⑪由此可知，要以暴力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而戊戌变法却不是如此。因为维新派不是以暴力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在保存清王朝的前提下，依靠封建皇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维新派虽然主张“全变”，并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但他却不是采用革命的手段来“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是企图通过改良（改革）的途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即逐步地达到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运动，不能把它称之为革命。史学界有人之所以把戊戌变法称之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主要是从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上立论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就是社会革命，戊戌变法的最终目的是要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所以它属于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范畴，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这就是说，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就是革命运动。其实，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不一定是革命运动。例如商鞅变法是一次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因为它标志着秦国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确立，但历史上不把它称之为革命，而把它称之为变法。又如俄国农奴制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变革社会制度的性质，但历史上没有把它们称之为革命，而是称之为改革和维新。显然，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采用革命的途径，如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二是采用自上而下改革的途径，如俄国农奴制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它们都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但却没有把它们都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它们都以变革社会制度为终极目的，但它们发生的历史条件（包括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资产阶级成熟和壮大的程度）和变革社会制度的速度，以及变革社会制度的质量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别。革命不仅具备了应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且它的发生是爆发性的，时间迅速，使社会制度发生质变（突变），改良或改革往往是发生在革命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它的发生是渐进的，时间是缓慢的，它使社会制度

发生量变（渐变），而逐步达到质变。显然，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存在着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改革两种途径，不能认为凡是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都是革命运动。既然如此，戊戌变法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来变革社会制度，而是通过改革的途径来变革社会制度，所以只能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运动，而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改良和革命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混淆。

维新运动虽然不是一次革命，但它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首次政治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首先，它是近代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里程碑。在此以前，虽然涌现过不少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为反对外敌入侵，有的著书立说，呼吁强国御侮，如魏源及早期维新派等；有的练兵制器，亲自帅军抗敌，如林则徐、左宗堂等；有的血战疆场，壮烈身亡，如关天培、邓世昌等；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曾相继掀起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但这些都是零星的，分散的，形成一次全国规模的以爱国救亡为旗帜的政治运动，无疑是从维新运动开始的。维新派奔走呼号，呼吁救国，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鼓舞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而献身，有人把“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相类比，这不是无道理的。不仅在戊戌时期，而且在戊戌以后的近代，甚至我们今天为“振兴中华”而从事的四化建设事业，都受着维新运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其次，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尝试。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早期维新派便逐步提出了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的要求，到康、梁为首的后期维新派，不仅在思想上比前者深化，而且力图把改造中国的方案付诸实践。在“百

日维新”期间，由于种种原因，维新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要求未能实现，但通过他们多年的宣传，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民权观，使君主专制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同时，通过他们立学会、办学堂、创报刊、开书局等实践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清朝的例禁，取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初步的民主权利。这次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在当时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因而在1895年——1900年间，又创办了100多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认为，维新运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近代化迈开了第一步。再次，维新运动最为突出的意义，是它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起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作用。维新派从变革社会制度出发，他们初步传播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及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有力地批判了君权神授论、君权不变论和封建的纲常名教，还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文化专制主义；同时，要求兴民权、兴西学，并通过学会、学堂和报刊，大力鼓吹西方文化，即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使当时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⑫的局面，许多知识分子“而争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⑬总之，形成了不可遏抑的思想解放潮流，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从封建的传统思想文化中挣脱出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维新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

(三)

维新运动虽然发生在甲午战争以后，但维新思想的酝酿却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正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宣告破产

了，维新运动又随之而起，因此，这两个运动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二者之间的联系，主要是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维新运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的产生，并替维新思想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也为维新运动提供了某些经验教训。如洋务派举办近代工业，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并吸收商股办企业，这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客观上有促进作用，而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正是维新运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洋务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出使大员，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同时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务的人才参与洋务企业和外交，其中有部分人从洋务运动的腐败中吸取教训，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派，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洋务派设立翻译馆，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科技书籍，主要是传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这就有利于当时一些有志于救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初步接触西学。据统计，1868年——1879年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共售书31,110部（多为科技书籍，间有国史、公法等书），卖出地图和海道图4,774张。康有为等人最早接触西学，差不多都是购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一经接触西学之后，他们通过中西对比，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优于中国封建主义，痛恨清朝腐败落后的现实，从拯救国家民族出发，从而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所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联系。

同时，这两个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点，这主要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只不过学习的目的和内容不尽相同而已。例如在经济上兴办近代企业，在军事上建立近代化的海、陆军，在文教上改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

两个运动在形式上有些相同，内容上也有某些近似，只不过在实质上有着差异而已。正是由于二者存在着某些共同点，所以曾经出现过早期维新派对洋务派的依附与合作，以致在思想上不能彻底划清界线；即使是康、梁维新派，在1897年前，也还幻想与张之洞为首的新洋务派合作，以致于看不清张之洞的面目而吃亏上当。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也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微弱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来自地主、官僚、买办有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地主阶级还存在着较多的联系。

但是，这两个运动之间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对立。

首先，两个运动的阶级属性不同。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洋务运动则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运动，由此而决定了两个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目的和历史作用都不相同。

其次，两个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内容。在政治上，维新运动要求兴民权，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洋务运动则要求尊君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有人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⑭，“早期维新派……实际上是洋务派”^⑮，这是只看他们之间的相同点，不看他们的本质差异。因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维新派虽然还停留在改变封建的经济制度上，但到八十年代则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即改变君主专制。所以维新派批评洋务派是“变枝节”而“不变根本”，认为洋务派只是“变事”而不是“变法”、“变政”，批评洋务派“根本不清，百事皆非”。^⑯所谓变“根